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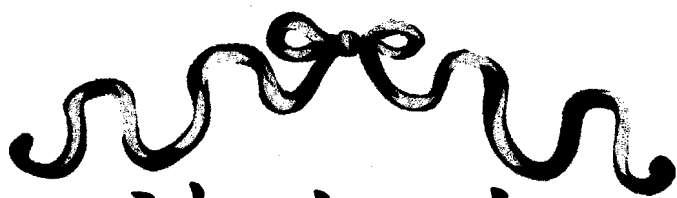


诗与真

近代欧洲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研究

王利红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诗与真

近代欧洲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研究

王利红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与真:近代欧洲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研究/王利红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ISBN 978-7-5426-3089-6

I. 诗… II. 王… III. 史学史—欧洲—近代 IV. K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1412 号

诗与真——近代欧洲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研究

著 者/王利红

责任编辑/钱震华

装帧设计/张新力

责任制作/李 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江苏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380 千字

印 张/21.25

ISBN 978-7-5426-3089-6

K·133 定价:38.00 元

19 世纪的历史科学是浪漫主义最骄傲的果实。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

亚里士多德：《诗学》

诗人根据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范畴来组织他的直觉，史学家则把他的直觉组织到或然性和不存在或然性的范畴之下，但这些便是惟一的差别。二者主题（直觉）的类型都相同，并且，他们的目标（表现这些直觉）也近似。由于他们的表现手段（语言）相同，他们的“方法”也一样。诗歌与历史共享的方法不过是日常言说的句法规则。

海登·怀特：《元史学》

浪漫主义史学的“蝶变”及其 永久的意义(序言)

2006年秋日,被誉为“中国民歌金凤凰”的宋祖英,越洋在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举办名为《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独唱音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翌年,同样在秋日,复旦大学相辉堂前,王利红身穿博士服,手执金灿灿的学位证书,在众人面前露出了绚丽的笑容……

两则场景,两位人物,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因为两人的“谱系”均是苗家儿女,当然就有了史学上所说的“可比性”:众所周知,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苗族的能歌善舞是出了名的,因而在它那里出了个优秀的歌唱家宋祖英,当然令人惊叹。同样令人惊叹的是,同为苗族出身的王利红,矢志不渝、发愤苦读,竟然成功地获得了历史学专业中较为艰涩难学的西方史学史方向的博士学位,这在苗家女孩中,我不敢说是惟一,但恐怕也是凤毛麟角了吧。

由利红的苗族血脉,使我联想到了“蝶变”这一词语。为什么呢?因为蝴蝶在苗族神话传说中,与这个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据苗族神话史诗《苗族古歌》的记载,蝴蝶乃苗族始祖,说蝴蝶妈妈生下了12个蛋,后孵化生出12个兄弟,成为苗民的先人。不是吗?现代苗家年轻姑娘头饰和服饰上的蝴蝶图案和蝴蝶扣等饰物比比皆是,它生动地反映了人们祈望始祖蝴蝶妈妈庇佑的心态。“蝶变”说的是蝴蝶从蛹羽化为蝶的过程,借用这一形象而又生动的词语,用之于近代欧洲浪漫主义史学的“从蛹羽化为蝶”的过程,亦即浪漫主义史学的

兴衰沉浮,我以为也是可以的。

我正这么想着,时空一下切换到了18世纪末以来的欧洲:此刻,大革命的风暴,已渐渐平息;攻占巴士底,早已成为一种梦幻的过去;残酷的现实,令人们失望;昔日那高扬的“理性王国”的旗帜,也悄悄落下;罗伯斯庇尔们所许下的诺言,要等到何时才能兑现……改弦更张,音调转换,时不我待,于是我们仿佛听到了“浪漫主义运动之父”卢梭对“自然状态”下原始平等的赞语,对人类情感与直觉感悟的强调;听到了浪漫主义史学的先驱者赫尔德的宣扬:理性主义的历史研究达不到对人类的真正理解,而历史却是理解人类的一把钥匙;听到了伦敦演讲厅英国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卡莱尔在作《英雄与英雄崇拜》时的哄笑与掌声;听到了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米什莱所发出的“历史是民族的史诗”那激昂的声音……

诚然,浪漫主义史学诸家所奏不可能是同一个音调,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浪漫主义史学身上的“羽衣”却在不断变换,这就是浪漫主义史学的“蝶变”。我这里只说及它的“三变”,并对它作一些总体的描述,既是回应利红的大作,也为读者诸君阅读这本书充当“导游”。

“初变”。启蒙运动时代理性主义史学与浪漫主义史学之关联,当然后者是在批判继承前者的基础上的一种发展,这一“初变”后形成的浪漫主义史学。一般说来它是作为理性主义史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所谓浪漫主义史学是对理性主义史学的反动是也。比如,在理性主义历史学家看来,理性的力量被视为改造社会、拯救黎民百姓的灵丹妙药和惟一力量,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此见与后来的浪漫主义历史学家相悖,后者贬抑理性,并不认为理性能有这样的超越一切的力量,在他们看来,这种理性恰恰扼杀了人类的创造性。人类的思想遗产之丰盈,是需要逐步积累的,倘要发扬光大,更需要传承。因此,在“前朝”与“后代”之间,思想遗产固然有间断性,唯其如此,才能体现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但也有其联系性与延续性,只有这样,方能呈现出人类思想文化的整体性。我个人认为,此见于理性主义史学与浪漫主义史学之关系也是如此。正如利红在书中所

说,浪漫主义史学从未把自己放在总体上来说与启蒙运动史学相对立的地位。他们也不缺少启蒙运动的精神,换言之,如果没有启蒙运动进步的历史观、世界主义的情怀以及对未来的乌托邦式的向往,浪漫主义史学的历史观也不可能形成。确实如此,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很“同情地”看待理性主义史学所产生的种种弊端。事实上,浪漫主义史学所提出的一些理念,正是针对理性主义史学的一些缺陷而产生的。浪漫主义史学的“初变”(最初形成),其“变”出“新”,但“万变”而不离其“宗”,亦即与理性主义史学有着难以割舍的千丝万缕的思想联系。

“再变”。浪漫主义史学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统一体,不仅它在各个地区的表现不尽相同,而且其内部派别丛生,歧异迭见。所谓“再变”就是说,在它的发展进程中,浪漫主义史学的“羽衣”在不同派系的历史学家那里所呈现出的不同色彩。比如,在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家那里,从政治上看,他们显然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种失望和仇恨;从史学上看,或许是对理性主义史学的一次倒退,如企图复活神学史观、无限美化中世纪、否认一切进步运动的历史合理性等等,都可为之佐证;在激进派浪漫主义历史学家那里,他们与前者不同,给人很突出的一点,他们力图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考察写作历史,同情下层群体,主张写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但这派史家在历史急速转变的关头,常常是左右摇摆,更有少数人成了资产阶级的卫道士;在自由派浪漫主义历史学家那里,则又是另一番模样,从总体来看,该派出现于历史舞台稍晚于前两派,直至19世纪20年代才成气候,并日渐取得近代欧洲各国历史学的支配地位,简单说来,他们与理性主义历史学家不仅在政治立场上相近,而且更多地体现在史学理念上的吻合,如理性主义史学中的历史进步观等。但凡此种种,都是与这派所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与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保守派浪漫主义史学曾称霸一时,这之后,就其总的趋向而言,起作用的是自由派与激进派浪漫主义史学,特别是前者,他们的史家在19世纪西方史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终变”。浪漫主义史学的“蝶变”，其最后归宿到历史主义。在我们看来，浪漫主义史学与历史主义是同根同源，虽然两者并不完全等同，但基本特点是相同的，浪漫主义史学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历史主义。浪漫主义史学随着浪漫主义思潮的消逝而解体，可是其精髓却构成了历史主义的主要特征，即个体性特征，历史主义继承了浪漫主义史学在思想上的一切优点，正是通过历史主义，将西方史学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影响扩展到了20世纪。且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叙事史的复兴，尤其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的“话语体系”中，都可察觉出浪漫主义史学的影响，并从中也可以观察到浪漫主义史学的诸多方面在现当代史家中所发生的“蝴蝶效应”。

以上所说，只是想粗略地勾画一下浪漫主义史学的概貌：从浪漫主义史学发端的时代背景，浪漫主义史学的产生及其发展，浪漫主义史学的诸家各派，浪漫主义史学的后世影响，……我正这么写着，忽然电话铃响了。噢，是利红打来的，当然是为了这个“序”。

我给这位弟子讲到了序文中浪漫主义史学的“蝶变”，是受到了她为女儿宋若词写的一篇文章（即《我注视女儿的美丽蝶变》）的启示，电话那头顿时传来了得意的而又爽朗的笑声。是的，利红进复旦攻博，宋若词只有5岁多，还是幼儿园大班的一名幼童，就在绘画、书法、英语等全国及省市少儿大赛中，崭露头角，其中两次获得金奖，被誉为“小神童”。就这样，她一面读书，一面注视着女儿的美丽蝶变。女儿长大了，利红也顺利地完成了学业。这双母女也真有趣，似乎在暗中较劲，看谁能最先完成“从蛹羽化为蝶”的“美丽蝶变”，演绎出人生的精彩。

说到了浪漫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学术意义时，利红在电话那头说：“浪漫主义史学犹如一座桥梁，它举足轻重、承上启下，连接起西方史学发展的长河。”“说得好。”我在电话这头说，“在浪漫主义史学的元素中，诸如历史发展具有个体的和独特的性质，而不存在普遍规律性；应当充分展示各国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具体特征，体现出每个民族所固有的‘民族精神’；强调历史现象的连续性、继承性和整体性，重视中世纪的历史地位；崇尚直觉的和情感的作用，重在对历

史作出具体的描述,藉以抒发作家个人的情怀等等。所说这些,无非想说明浪漫主义史学的上述诸‘元素’在西方史学发展的进程中的及对历史学发展所具有的永久的意义。”

说到了《诗与真》的书名,使我想起了前辈文学家梁宗岱先生对现代法国诗人梵乐希(Paul Vale,现通称为保尔·瓦莱里)的赞语:

它底颜色是妩媚的,它的姿态是招展的,它底温馨却是低微而清澈的钟声,带来深沉永久的意义。^①

我当然不是说,要把梁先生对一位“浪漫主义底余威已消灭殆尽”^②年代里出世的法国诗人的评价,完全移植于王利红博士,那是不妥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苗族这个生性美丽的民族,她的儿女,其色彩、其姿态、其温馨,当然决不会亚于梵乐希的。在这里,还应补白一句是,苗族儿女夥矣,但像利红那样在艰涩与冷门的专业中寻求乐趣与志向,对浪漫主义史学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作出了贡献,恐怕是不多的“稀缺人才”了,不信吗?请您试着再找一位来看看。

是为序。

张广智

2009年5月12日

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① 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② 同上书,第10页。

导 言

史学史是研究和阐述历史学本身发展的历史的学科,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都离不开具体的史学流派,每一历史时期的史学发展都体现在当时主要的史学流派的发展中。故研究西方史学史,除了要研究历代西方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之外,“特别要研究社会转型与历史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的史学思潮,研究这种史学思潮的特点及走向,研究体现这种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的思想趋向”^①。

纵览整个西方史学发展的历史,我认为,浪漫主义史学就是这样一个对历史学本身发展来说很重要的史学流派。可以说,它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19世纪正是西方历史学专业化的时期。在此期间,专业历史学本身经历了一个与文学脱离的过程。作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学流派,浪漫主义史学既不同于此前的启蒙运动史学,也不同于此后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因为所处地位的特殊,它成为西方史学史上一个重要而合理的阶段,不仅体现了19世纪史学发展的时代特色,而且体现了历史学本质的另一个同样十分重要的侧面^②。浪漫主义史学的重要性表现在它总结了它之前的史学发展的成果,丰富了历史学本身的内涵,在历史理论和历史编纂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做出很多新的尝试。它在当时提出的问题,如

① 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页。

② 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

历史发展的个体性、多样性、偶然性、间断性、连续性和整体性问题；历史，作为一种有自身的独特生命的过程总体，它所具有的生成性、变动性、神秘性、内在性、精神性、情感性和意志性的力量等问题^①；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历史写作是否具有主观性，历史想象和虚构在历史写作中的作用，语言的表述和多种写作手法的运用，原始材料的鉴别和选择；历史学与文学、哲学、语言学、政治学、美学、心理学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历史学家的职责和使命等等问题，不仅在当时充实和完善了史学本身的发展、拓展和延伸了史学发展的空间和维度，加快了史学专业化的进程，而且有不少正是今日的历史学正在凸显和讨论的问题。

可以说，处于历史学步入专业化时期的浪漫主义史学，具有着转型时期史学发展的内涵丰富，异彩纷呈的特色，既具有开放性又兼有包容性，是史学发展史上最有魅力、最引人深思的阶段之一。仅就浪漫主义史学本身与启蒙运动史学（包括启蒙运动史学之前的史学）和它之后的实证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传承关系来看，浪漫主义史学的研究，就很具有吸引力和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以及指导历史写作实践的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浪漫主义史学时期是西方史学史上一个精华荟萃的时期，它上承启蒙运动史学之前（包括启蒙运动史学）西方史学发展的成果，下启西方史学专业化道路，远播种子于后现代史学，它的影响早已超出它的时代，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影响或隐或显，或多或少，但总不会消失，伴随着史学发展的进程。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学家常常回顾 19 世纪初，视其为历史学科的古典时期，这不仅因为历史在当时被视作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出现的，而且因为在历史、艺术、科学和哲学之间有一种紧密的工作关系和交流。浪漫主义艺术家在历史中寻找主题，用‘历史意识’证明他们为使文化再生而付出努力的合理性，即把过去变成其同时代人的

^① 参见[法]高宣扬：《德国哲学通史》第一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47 页。

活的现实。”^①

然而,由于浪漫主义史学与近代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密切关系,浪漫主义史学所深深地隐含和表现出的浪漫主义诗学和哲学的情调,以及在它之后伴随着史学专业化进程而来的客观主义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一统天下,浪漫主义史学流派的重要性在历史学一味追求“客观”、“公正”和“科学”的时代被忽视和过分低估了。浪漫主义史学的研究,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就我所知,不管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缺乏对浪漫主义史学思想所做的深入细致和全面的理论探讨。这可能基于以下原因:一是由于浪漫主义史学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模糊性、神秘性、无体系性(或混沌性)以及其特殊的著述方式——浪漫主义史学家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喜欢建构系统的理论体系,强调人的自由创造和表达的无限性,这使他们的写作呈现出开放性和多样性的色彩,他们对史学思想的论述和观点散见于各种论文和著作中,我们只能通过他们的历史写作、论文、哲学思想、自传、书信、散文、日记和笔记等来窥见其思想;另一方面,是由于浪漫主义史学与近代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密切关系,使得要全面系统地研究浪漫主义史学思想,将会涉及到诸多问题。仅就浪漫主义运动本身而言,要弄清楚它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因为与浪漫主义运动相关的思潮就有新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工业革命。而要弄清楚这些看似与研究不相关,实则有着这样那样联系的问题,不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还需要具备跨学科研究所需的理论素养;再有一点,这一点可能是阻碍研究的主观原因,这就是“以现有主流的历史观念来看,浪漫主义这个词似乎不应该出现在历史学中,因为它暗含着情感的迸发,而与我们惯常主张的以事实为根据和消除历史学家个人情感的专业历史学相矛盾。”^②

^①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② 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

上述原因,可能最终导致了对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的研究相对滞后,与它所具有的重要性不相称。这正是促使我进行研究的主要动力。但说实话,我本人其实并不具备完成这一重大课题所需的功力。一开始我只是出于好奇和兴趣,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研究的份量和重要性。而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就深感自己学力不够,要完成这样一项研究,存在很多困难。好在经过多年来对资料的收集、整理、阅读、思考和写作,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这一课题的了解和认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在汉语学界,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浪漫主义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与历史学没有关系,国内学术界关于浪漫主义的探讨大都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从史学角度研究浪漫主义对史学发展影响的不多。目前国内已出版的各种西方史学史教材和著作中,对于浪漫主义史学思想只做了简要的介绍和初步的探讨,大部分停留在对浪漫主义史家生平和作品的介绍,理论上的建树不太多。涉及到浪漫主义史学思想和浪漫主义史家和史著的著作主要有^①:宋瑞芝先生主编的《西方史学史纲》,里面提到浪漫主义史学和赫尔德的历史哲学;郭圣铭先生编著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书中对米什莱和卡莱尔的浪漫主义史学思想做了评述;孙秉莹先生编著的《欧洲近代史学史》,书中专辟一章讲述了浪漫主义的出现和德国的浪漫主义史学家;杨豫先生所著的《西方史学史》,对浪漫主义史学着墨较多,书的第八章,专门论述了浪漫主义史学,对浪漫主义史学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形式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杨先生认为,浪漫主义史学弥补了理性主义史学由于否定中世纪而造成的历史研究中的空白,他认为民族性是浪漫主义史学的研究主题,对民族历史的撰写构成浪漫主义史学的主体,

^① 参见宋瑞芝主编:《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187页;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167页;孙秉莹编著:《欧洲近代史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141页;杨豫著:《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304页;郭小凌编著《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253页,第255—260页,第294—297页,第293—296页;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211页。

他肯定了浪漫主义史学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书中对浪漫主义史学思想,提出了很多很有见地的观点,是目前国内比较全面的关于浪漫主义史学的论述;郭小凌先生编著的《西方史学史》,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赫尔德的史学思想,对米什莱和卡莱尔的浪漫主义史学思想和表达形式都有分析。书中比较有创见的地方在于他提出了一种比较新的对浪漫主义史学和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史学的关系的看法,即浪漫主义史学与理性主义史学的差异无论是就表面还是实质来说都不明显,浪漫主义史学仍然依赖于启蒙时代所建立起的整个理性主义史学的大厦,只是在局部做了一些改装和修缮,其中最重要和最显著的修改部分是对中世纪较为客观的肯定,对中世纪史的认真研究;其次是在处理古代史料方面抛弃了过去轻视甚而无视神话传说的做法,肯定了它们具有真实意义;同时批评了一般启蒙史家轻视史料建设的空疏学风。他认为在史学研究的其他方面,浪漫主义史学继承了理性主义史学思想的大部分成果,如历史进步、历史规律性发展等意识。郭先生认为浪漫主义时期的西方史学是对启蒙史学的一种扬弃,如同启蒙史学是对文艺复兴史学的扬弃一样。^①遗憾的是,书中只是提出了观点没有在理论上作出具体的系统论述。

目前国内出版的最新的西方史学史著作是张广智先生主著的《西方史学史》^②。书中明确提出浪漫主义史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以及它在西方史学史上所处的地位,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浪漫主义史学的思想内涵、主要特征、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史学家及其影响,并论述了浪漫主义史学与历史主义的关系,是国内有关浪漫主义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本书的写作,在很多地方直接受惠于上述各位先生的著作,作了更进一步的深入研讨,充分体现了学术的薪火相传。

关于浪漫主义史学研究的论文很少,比较有影响的论文有赖元

① 参见郭小凌编著《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② 本书共有两个版本,即2000年的第1版和2004年的修订版。

晋《十九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史学的性质和地位》^①,主要以法国为例,分析了浪漫主义史学的性质和地位。其他一些论述西方艺术史和哲学史的论文,对浪漫主义史学略有提及,如尚杰《启蒙世纪的另一半:古典的浪漫主义》,曹意强《米什莱:倾听历史的“寂静之声”》^②,以及本书作者近几年发表的相关论文。

相比之下,国外的研究要更丰富一些,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涉及的问题也更多。但就我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尚未见到有关浪漫主义史学的专著,大部分著作都只是在书中谈及浪漫主义史学或浪漫主义史学家的作品和思想。比较有影响的,涉及到浪漫主义史学的著作,有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书中第四十章专门论述了浪漫主义的出现对史学发展的影响,指出浪漫主义热情地求助于过去,特别是中世纪,因而对德国的历史写作产生的有力而有益的影响。书中强调指出浪漫主义史学确立的历史连续性原则,认为浪漫主义史学所主张的,只有按历史规律发展的东西才可以说是有用的论点,从根本上推翻了理性主义者的非历史的论述。书中重点论述赫尔德的史学思想和德国的历史写作,对英、法两国同一时期的历史写作也进行了评述,但从整体上来看,比较零散,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的特色之一,就是辟专章讲述法国的浪漫主义史学,重点论述夏多布里昂、梯叶里、巴兰特、米什莱等几位重要的法国浪漫主义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及其作品,其中特别论述米什莱的浪漫主义史学思想,他的民主精神、民族主义思想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对米什莱在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做了很高的评价。以上两本书都侧重于对史料分析和论述,比较欠缺理论上的探讨。

真正从理论上对浪漫主义史学思想进行论述的是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他们看到了浪漫主义史学在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对

① 参见赖元晋:《十九世纪西方浪漫主义史学的性质和地位》,《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② 参见尚杰:《启蒙世纪的另一半:古典的浪漫主义》,《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曹意强:《米什莱:倾听历史的“寂静之声”》,《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15日。

浪漫主义史学思想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高度评价了浪漫主义史学对史学发展的贡献,不仅拓宽了浪漫主义史学研究的视野,而且使研究进一步深化。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①中,把浪漫主义史学称为怀旧性史学,认为它培养了对过去的同情,再不是对过去时代的轻蔑和嘲笑,而是把过去时代的智慧作为现在与将来的部分,它使历史本身方方面面完整充实并面目一新^②。克罗齐看到了浪漫主义史学对发展观念的重视和强调,看到了浪漫主义史学在考据(即博学)和思想之间建立的联系。他说,我们应该感谢浪漫主义的是,“由于它的缘故,学者与历史家之间,即寻求材料的人和思想家之间第一次建立了关系,实现了融合”^③。他认为这是在18世纪没有发生过的情形。

克罗齐的观点对柯林武德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柯林武德发展了克罗齐的思想,进一步论述了浪漫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他说:“这种概念应用到历史学上就意味着,历史学家一定永远不要做启蒙运动历史学家所经常做着的事,那就是以鄙视和厌恶的态度去看待以往的时代;历史学家必须以同情的态度去看待它们,并在其中发现真正的而又可贵的人类成就的表现”^④。他认为,浪漫主义思想代表着一种新倾向,即要在和它自己大为不同的各种文明中看出一种积极的价值和趣味来。这样一来,浪漫主义者们(包括浪漫主义的历史学家们)^⑤就是以双重的方式在设想中世纪那

① 这本书有两个不同的译本,一是傅任敢从英译本转译的,商务版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其中有关浪漫主义史学的那一部分的题目是“浪漫主义时期的史学”;另一个最新的版本是田时纲根据意大利文直接翻译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与浪漫主义史学有关的部分的题目是“浪漫主义历史学”。论文在写作时,同时参照了两个版本。

② 参见[意]克罗齐:《十九世纪欧洲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③ [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21页。

④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8页。

⑤ 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是在他死后三年由友人诺克斯于1946年编辑出版的,因此我认为它思想上更具有创造性,但行文中可能更随意,不够严谨,故有时候在阅读和理解时我加上了自己的理解。

样一种过去的历史阶段的价值：部分地是其本身具有永久价值的某种东西，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独一无二的成就；部分地又是在导致了那些具有更大价值的事物的那一发展过程之中而出现的。由于兼有对过去时代的同情和启蒙运动进步的历史观，浪漫主义史学家就把全部过去都看作是值得研究的并且是一个整体。这样一来，历史学思想的范围就大为开阔了，于是历史学家就开始把人类的全部历史认为是从野蛮状态开始而以一个完全理性的和文明的社会告终的一场单一的发展过程^①。这样一种对待历史的崭新态度，成就了浪漫主义史学。而第一次以这种新态度对待过去的人，柯林武德认为，是赫尔德和他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这一标志性的著作。

柯林武德对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的概括和论述，虽然篇幅很少，但堪称经典。他抓住了浪漫主义史学最主要的特征和思想内涵，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为深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和思路。本书的写作，在很多方面直接受到他和克罗齐思想的启发。可惜的是，他们两人都没有追溯浪漫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没有具体阐述浪漫主义史学思想形成的原因和它的理论渊源，而是直接提出和论述其观点。其思想的确立犹如一座孤峰，虽然高大挺拔，但显得突兀，缺少必要的铺垫和陈述。

另一位特别值得一提的研究浪漫主义史学的重要学者是海登·怀特，在他的成名作《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怀特创造性地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史学领域，从历史编纂的角度，对浪漫主义的观念和撰史风格进行了深入的理论考察。其中特别强调了史与诗的内在统一，其立场似乎与亚里士多德对诗与史的观点针锋相对，反映了认识上的发展。怀特认为，史与诗并不存在截然断裂的鸿沟，任何史学作品都包含了一种深层结构，它是诗学的，实质也是语言学的。从这种观点出发，怀特具体分析了浪漫主义史家赫尔德、米什莱、诺瓦利斯、贡斯当和卡莱尔的历史思想观念、历

^① 参见[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9—141页。